

【特别约稿】

“发展起来以后”的重大战略抉择

——学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考

周毅之¹, 尹强²

(1.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 南京 210013)
(2. 上海理工大学 基础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大国,但中国已经摆脱不发展状态而发展起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重大战略抉择。这一重大战略布局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当下中国发展实践相统一战略成果,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重要命题的战略呈现。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新阶段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

关键词:“四个全面”; 中国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15)02-0001-05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最大国情仍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当下中国已摆脱当年不得不为求温饱而努力的不发展状态,国际社会公认中国已发展起来并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①这样一个大国,要发展起来不容易,但“发展起来以后”仍将面临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发展起来以后”的社会关系结构、经济运行方式、国际安全局面、国家和社会治理等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要求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作出全面性的新抉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这一发展阶段直面当下问题、回应现实挑战的重大战略抉择。透彻地认清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

点,清晰地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科学内涵和战略智慧,才能在实施和展开这一重大战略布局时更有使命意义上的坚定,更有实践意义上的科学自觉。

一、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发展起来以后”国家战略布局的理想特性

国家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的形成,是国家价值理念的实践追求,是应对现实社会生活进程的宏观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当代中国凝聚为全社会的最大共识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

收稿日期:2015-05-05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周毅之,哲学博士,政治学教授,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研究方向:政治哲学。

尹强,讲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① 按照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与人均GDP大致相当)处于3 856至11 90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4 277美元,2014年约为7 485美元,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梦,以及以“三个倡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全面战略布局。而这种战略价值目标和总体布局的设计,当然必须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为前提。中国共产党人先期发展阶段为应对中国的不发展问题而形成的战略曾经取得过卓越的成就,今天则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性和实践主动性为应对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形成新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由此应运而生。

世界经验表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既苦于未得充分发展以臻于发达,又苦于已经发展起来而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这是一个矛盾叠加、问题胶着、首尾踌躇、容易按下葫芦漂起瓢的时期,是一个特别需要驾驭全局、协调各方的全面性战略智慧的时期。从20世纪看,世界上凡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并非都能成功地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甚至不是多数而只有少数经济体能由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而大量的这种经济体在过去五六十年里一直停留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 000至10 000美元的区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具决定性的一个因素是国家战略布局的“路径依赖”。许多这样的经济体在应对“发展起来以后”的一系列问题时,仍依赖从不发展状态中走出来时的单面性突破的战略,缺乏全面性协同的战略安排和战略智慧,在治国理政中常常自我设限、首尾失顾、捉襟见肘、短板频现。

这种脱不开“路径依赖”的战略特性,虽形态各异,但一个基本相通之处在于容忍乃至放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未得顾及乃至放弃发展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追求。具体看,其一,放纵经济运行中的不平衡走势。由于初期发展形成的资源驱动和资本驱动的传统惯性,特别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保守,经济转型艰难,创新能力滞后,往往发生速度与结构、规模与内质、资源环境与发展需求、不同区域发展等等的严重不平衡、不协调,一旦无法弥合这些对峙,发展就会陷于停滞乃至崩溃。其二,放纵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对称、不协调。初期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无暇关注、无力化解,甚至因经济转型艰难而加剧“马太效应”,财

富在少数人手里的集中引发社会对峙和对抗。其三,放纵权贵势力和民粹主义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顾国情特点盲目照搬西式民主而导致政治乱象和社会无序化,法治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国家治理能力严重短缺。其四,放纵既得利益集团的价值贪婪,权力游离于“制度笼子”之外,缺乏合理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面对社会矛盾和冲突,要么束手无策而任凭墙倒众人推,要么毫无顾忌地运用极端手段而撕裂社会。其五,放纵发展和治理各项制度、体制的传统惯性,加上利益固化的樊篱和对改革风险的恐惧,诸多重要领域的改革难以启动或者浅改辄止、屡改屡败,最终不得不放弃国家进步所必需的改革追求。

世界经验,历历在目。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需要高度战略自觉的阶段。这包括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的自觉把握,对先期发展阶段发展和治理战略“路径依赖”的自觉克服,走向自觉的战略适应性创新。这种战略上的适应性创新,集中表现在对发展和治理中的种种不对称、不平衡、不协调的摒弃,实现对发展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追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在十几亿人口的一个大国“发展起来以后”所推出的宏大规模的战略适应性创新。毫不讳言,当下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诸多既往经济起飞阶段为突破不发展状态而积累的问题,也面临着既往发展进程中未曾出现或未曾充分凸现的问题。比如,经济总量领先与人均水平落后的不对称,先富与共富关系的不协调,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转型发展要求的不对应,创新能力的成长与创新驱动发展走势的不适应,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所形成的治理压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与国家治理目标的距离,等等。这些问题在中等收入经济体来说大体相通,而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成功应对则史无前例,其战略难度之大、对治理能力要求之高显然史所未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这样一个无先例可循的战略安排,一个事关中国命运乃至关联世界发展格局的战略设计,一个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独特战略个性和战略掌控能力的战略布局。这一战略布局,“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1]这是一个充分体现追求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宏大战略布局，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

二、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指向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展示出来的高度战略自觉和战略智慧，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结晶，是对中华民族所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所作出的负责任的选择。党的十八大闭幕的当月，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集体理论学习会。会议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2]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界定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价值内涵在当代中国的新整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发展的一个新判断。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有一个全面性的战略布局。这一全面发展的战略理念，为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提供了决定性的总导向。由此展开和延伸，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继而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形成“四个全面”的完整战略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当代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逻辑相统一的成果。科学社会主义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

则”^{[3]649}定义为自身的最高价值理想，这是对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异化社会、单面化社会、物化社会、碎片化社会的直接否定。当资本的权力主宰着社会的时候，以物的关系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结构把持并操纵一切人的生活，每个人都碎片化为物的关系体系的零件，人的全面性不复存在，已经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的人的关系必然走向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财富与道德的对立、政治社会中形式与实质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等等。即使能在其可以容纳的空间里发达起来，但无从根本解决的“1%和99%的对立”^①仍然时时撕裂着整个社会。正是以这一社会关系体系为实现历史性否定的对象，科学社会主义建立起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基础的理论逻辑，建立起以社会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的实践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价值实现。

当然，中国建设事业在既往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战略性失误和实践的曲折，遭遇过不得不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不发展状态。当时为摆脱这种状态，必须在重点领域重点突破，以“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僵化体制，以启动竞争机制实现快速增长。邓小平以卓越的政治智慧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构思，提出了“速度就是政治”的发展要求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战略安排。这是切中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性、适应时代潮流的战略布局。随着其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这一战略布局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在短短三十来年的时间里，不仅摆脱了为求温饱的不发展状态，而且使13亿多人口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完整而准确地看到，在这种重点突破战略构思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疏忽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指向。邓小平始终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是要走向“共同富裕”；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其后党中央又明确提出“三个文明一起抓”；强调持续

^① “1%和99%的对立”，最初为美国社会活动家大卫·德格瑞所提出，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用此提法。

快速增长的同时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其后党中央又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为打破僵化体制而成功采取重点突破战略安排时,仍然保持着应有的战略清醒,审慎防范着全面发展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价值失落,并富有前瞻性地指出,一些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总有一天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4]364,374}。

当中国摆脱了不发展状态而进入发展起来的阶段,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体系及运行方式出现重大改变,“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的问题真正摆上桌面,而原先未曾出现甚至未曾预见到的问题也凸显出来。从宏观历史视角看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已跨入一个新的进程。“因时之变,以为之备”,在这个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明确了一个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引领时代发展潮流的价值指向,并且把这一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向贯彻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中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中国治国理政顶层设计的一个新境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飞跃。

三、在新发展阶段把握全面战略布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

把握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在战略主体来说是对战略态势的理解和驾驭,对战略预期的设计与权衡,对战略资源的动员和配置,对战略进程的导向与调控。“大盘取厚势,官子有妙手。”治国理政中的战略构思和战略运作,在决定性的意义上取决于战略主体的思想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指出,在当下中国已经发展起来的新阶段,更应看到“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矛盾纵横交错,问题相互胶着,因而必须真正“善于处理局部与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有利的战略抉择”,为此就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

智慧的滋养”^[5]。

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时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742-743}作为方法,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为共产党人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哲学智慧的滋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当年驾驭革命大局的根本方法论,是后来驾驭执政大局的根本方法论,同时也是当下在十分复杂的关系格局中治国理政的根本方法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本身就是成功运用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战略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所滋养的战略成果。而展开和落实这一战略布局,同样要“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首先要准确把握当下客观实践的进程及其历史发展内涵,这是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认识论前提。既要看到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又必须看到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这是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立足于这一客观基点,才能“换脑筋”,才能与时俱进,才能形成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适应的战略理念。僵化保守、故步自封、放任战略上的“路径依赖”,就无法进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境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必须在客观事物的矛盾和运动中把握社会生活实践。世界本来就不是单面的,更何况当下既苦于尚未充分发展到发达水平,又苦于发展起来的过程中积累的问题和包袱。所以必须有矛盾的观点、运动的观点,必须有问题意识、问题导向。这样才能既正视矛盾、直面问题,又善于运筹,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同时必须用辩证的眼光观察世界,用辩证的理念理解世界,用辩证的思路应对实践中的问题与挑战。展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应有与之相匹配的辩证思维能力。局面越是宏大,问题越是复杂,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治国理政中对辩证思维能力的要求就越高。只有娴熟掌握辩证思维,才能既统揽全局、心中有数,准确总体谋划,完善顶层设计;又合理权衡,突出重点,牵住

“牛鼻子”，牵动大局面。这正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战略智慧，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智慧。

参考文献：

- [1] 人民日报评论员. 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N]. 人民日报, 2015-02-25(1).
[2] 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N]. 人民日报, 2012-11-19(1).
[3]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5]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 人民日报, 2015-01-25(1).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A major strategic choice for “The Post-development Period”: Reflections on “The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y

ZHOU Yizhi¹, YIN Qiang²

(1. Publicity Department, CPC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Nanjing 210013, China;
2. College of Basic Scienc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developed out of the underdeveloped state. “The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y is a major choice that emphasizes more on systematic, holistic and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for “The Post-development Period”. This important strategy is an accomplishment by incorporating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ory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practice, represent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proposition tha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fully developed socialism”. The grasping of “The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y in the new post-development period calls for continuous inspiration of the Marxism philosophical wisdom.

Key words: “The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he Chinese Drea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xism

(责任编辑:刘云)